

黄玉顺/著

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

黄玉顺/著

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 / 黄玉顺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5
ISBN 7-220-05923-X

I. 超... II. 黄... III. ①玄学—研究②科学哲学—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406 号

CHAO YUE ZHI SHI YU JIA ZHI DE JIN ZHANG

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

黄玉顺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王定宇
解建华
古 蓉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1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5923-X/B·257

定 价

2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郑家栋 (1)
一、几个前提问题 ·····	(9)
1. 科玄论战的“问题”所在 ·····	(9)
2. 心灵的结构 ·····	(18)
3. 意识的形式及其基础 ·····	(26)
二、科玄论战的背景 ·····	(47)
1. 西方哲学文化背景 ·····	(47)
2. 中国思想文化背景 ·····	(88)
3. 1919: 历史潮流的转折 ·····	(101)
三、科玄论战的过程·····	(118)
1. 棒打“玄学鬼”: 论战的缘起 ·····	(119)
2. 戏谑与紧张: 论战的展开 ·····	(143)
3. “布尔什维克”的声音: 论战的深化及其结局·····	(189)
四、科玄论战中的“人生观”概念·····	(211)
1. 玄学派的“人生观”概念 ·····	(212)
2. 科学派的“人生观”概念 ·····	(222)
3. “人生观”概念的二重性与一贯性·····	(235)

五、玄学派评析·····	(240)
1. 玄学派的科学观·····	(240)
2. 玄学派的哲学观·····	(258)
3. 玄学派批评·····	(267)
六、科学派评析·····	(275)
1. 科学派的哲学观·····	(275)
2. 科学派的科学观·····	(280)
3. 科学派批评·····	(293)
七、唯物史观派评析·····	(306)
1. 唯物史观派的立场·····	(306)
2. 唯物史观派的语境解析·····	(312)
3. 唯物史观派批评·····	(322)
八、关于“玄学”的几个问题·····	(335)
1. 玄学与形而上学·····	(336)
2. 玄学与哲学·····	(344)
3. 玄学与科学·····	(351)
附 录	
科玄论战月表·····	(367)
主要参考书目·····	(373)
后 记·····	(380)

序

郑家栋

“论战”一语似乎不见于中国典籍，较为相近的“论难”一词，倒是在《汉书》、《后汉书》已经多见。相比较而言，“论战”似乎更能够凸显“以文字决胜负”之意，而“以文字决胜负”显不为国人所好。“舌战群儒”似乎颇有“论战”的气象，但“舌战群儒”一般属于“宫廷议论”之类，通常已经设定了裁决者，汉昭帝年间召开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舌战”众贤良、文学，就是一例。

20世纪以降，“论战”勃兴，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可载入史籍者，亦有数十次之多。若究其原因，传统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然坍塌，思想的确定性失去了社会法权的卫护，失去了强制性的尺度，这是前提。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倘若这“规矩”不只是关涉到某种形式化的原则（差不多属于游戏规则一类），而是已然预设了实质性的结论，“论战”也就成为多余之物，50年代后的数十年间有“批判”而无“论战”，盖与此有关。“论战”的旨趣在于“以理服人”，在于说理与论证，思想与言论自由乃为必要条件。此外，传统思想贬抑“巧言令色”，而推崇“刚毅木讷”，现时代则“人心不古”，争强好胜，以标新立异为尚，也不失为“论战”迭起的原因之一。

“论战”曾经是人们处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形式。思

想史就是政治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甚至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战争史”，君不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居然成为贯通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的体例。于是乎，“论战”也就平添了“杀伐之气”，实际上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厮杀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史论战”等相比较，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自然要受到冷遇。至少自20年代后半期始，“中国向何处去”基本上被处理为一个政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政权”问题，“革命史观”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党争”取代了“五四”时期的文化之争。从伴随着刀光剑影的历史主旋律的角度看，“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不仅太“文人气”了，而且简直就是无病呻吟。

差不多直到80年代中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才浮出水面，并且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初期着实“火”过一阵。说它“火”也并不是指有很多人研究，只是人们经常提到它，后来似乎又淡下来了，原因或许在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还只是限于提出问题，“玄学派”的观点，此后在当代新儒家的发展线索中有深入而具体的展开；而“科学派”的观点，则只是成为了“革命史观”（“唯物史观”）的垫脚石。简单的使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观念来套解此一条发展脉络，意义不大。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作一大致的说明。1923年2月14日，张君勱在清华园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科学”则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学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之齐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诚如胡适所言，在“科学”一语具有“无上尊严”的“五四”时期思想界，张氏的见解确属非常之论。演讲稿在《清

华周刊》刊出，张君劢的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阅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参见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随后，丁氏以万余字长文发表于《努力周报》，痛斥张君劢为“玄学鬼”，论战由此爆发。1923年12月，亚东图书馆集结论战的文章，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文章作者除张君劢、丁文江外，还有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林宰平、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唐钺等，学者名流几云集于其间。论战一直持续到1924年底。

那么，“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意义究竟何在？有人说是“思想史的”，有人说是“哲学的”，而50年代后的正统说法则是“政治的”“唯物史观”的胜利。有趣的是，后一种说法，或许更能够切中要害。虽然就论战本身而言，“唯物史观派”似乎并不重要，所谓“胜利”云者，更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问题，但是“唯物史观派”的参战确实代表了某种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此种转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思想与社会后来发展的总体态势。

说“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联盟，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前者的总体姿态是超越于两派论争之上，它也确实超越于两派论争之上。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开篇就说：“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陈氏大讲孔德所谓“历史三阶段”，并断定中国社会“还在宗教迷信时代”，“科学与人生观”也不是什么“永恒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中的问题，“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里重要的在于：陈独秀主张回到“历史观”的层面来回答和解决问题。胡适曾反驳陈氏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陈独秀并不是混淆了两个层面，而是着意为论战下了一个“转语”：重要的是“历史观”，而非“人生

观”，“人生观”必须无保留的统摄于“历史观”，与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相比，个体性的“情感”、“意志”、“信念”、“良知”等等，都无异于梦呓，“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科学主义”，而是一种“科学”与“玄学”打拼为一、统合了科学的“客观性”与玄学的终极性和超验性的“历史观”，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人们所必须依从的大经大法。一切都是历史的、变动的，一切又都是确定的、不可违逆的、具有某种终极指向的。现实的历史就是存在的真实。历史观被提升为一种科学化的“玄学”或曰玄学化的“科学”。而历史的核心内涵就是“阶级革命”，“个性的先觉仅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此语从外表文弱，并最终还是难以摆脱某种文人情调的瞿秋白口中说出，总是难免给人某种错位之感。

“天人合一”，“内在超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历史观”，分明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史观不同，可是我们于其中又分明可以扑捉到某种传统的身影。去“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不远，便爆发了“社会史论战”。通过“社会史论战”，那种超越的、绝对的历史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取得了解释中国历史的支配权，革命史观也彻底吞噬了现代化史观。于是乎，一切似乎都不过是在演绎一个早已决定了的、宿命的谶语。

以“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来表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似忽略了“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也确实忽略了“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规约化的“历史观”代

替了复杂的社会理论，政治的、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淹没了一切。在名目繁多的论战中，大约只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接触到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当然也只是在肤浅的意义上。这一类问题，既不能够归结于“古今之间”，也不能够归结于“中西之间”，它们是“现代性”内部的问题，关涉到“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难以消解的价值冲突。提出和接触到这一类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特异之处。

“科玄论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文人气”。这不仅在于名流学者云集于其间，而且在于论战本身没有政治势力作背景，后来的“社会史论战”和“唯物辩证法”论战，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排除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许多人都属“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角色，甚至不乏“党魁”之类。但是，当时的思想壁垒尚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壁垒，倒是邓中夏（另一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底的一篇文章，着重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厘清论战中三派的界域：“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当政治斗争演化为武装割据之后，阶级的壁垒也逐渐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批判的武器”也就真正成为了“武器的批判”的一部分，“笔场”成为“战场”，成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另一种厮杀，此一条线索并不是自50年代始。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论战，总会觉得丁文江的尖刻、陈独秀的粗野，都还存留着某种文人的率直与质朴，而与后来人们所领教的那种斗狠与霸气不同。而不免于“文人气”的陈独秀，在后来残酷的政治角斗面前“右倾”，成为失败者，也算是“题中应有之意”。论战双方的主将张君勱和丁文江，是很好的朋友。丁文江出来“叫板”，且放马过来，举刀便砍，张君勱似乎也并

不以为这是忘恩负义或用心险恶，可见那时的学者文人们，倒还是有些胸襟与气象，路是给后人越走越窄了！

说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不能不说张君劢。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研究一直颇受关注，许多人物都被翻来倒去，有些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其在世之时。而关于张君劢虽然也有数本文选、评传出版，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理睬。原因何在？是“玄学鬼”的帽子所至？非也。就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而言，真正担得起“玄学鬼”之称的，怕是要属熊十力、牟宗三师徒，绝对轮不到张君劢。

“学术与政治之间”一语，已用的过滥，但用之于张君劢颇为恰当。就政治而言，直至1949年流亡之前（时52岁），张氏一直处在政治的漩涡之中，追随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辛亥革命后斡旋于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参加讨伐袁世凯，介入黎元洪、段祺瑞之争，担任段祺瑞总统府秘书一职，组建、改组国家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抗战时期参加国防参议会，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调停东北内战，出席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和“立宪国大”，参与改组政府，拒绝李宗仁出任行政院长之请，曾经被国民党方面绑架、软禁，后又被共产党列入“头等战犯名单”最后一名，等等。就学问而言，得过秀才、翰林的功名，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两度留学德国，可以用德、英、日三种外语写作，创办政治大学、学海书院、民族文化书院，曾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50年代后作“环球讲学”，写作《新儒家思想史》，等等。

张氏其实是个苦命的人，做学问的时候向往政治，做政治的时候又向往学问，在所谓“学问国”与“政治国”（张君劢语）之间游来荡去，虽然屡屡表示要“断念吾第二生命之政治”，一

心向学，可一旦时机成熟，又奔走于其间而决不怠懈。这样说法不是以张君劢为一投机者，亦不是要表现时下文人那种做作的清高，似乎污秽与高尚的划界就在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而实际上，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张君劢的不幸则在于怀“学问”之心而投身于政治，因而总不免对于政治的严酷心存侥幸。在国、共格局大定之时（1951年前后），张君劢却还要在香港搞什么“第三势力”，胡适正色告之曰：“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烈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毛泽东似乎说过相近的话）倘若政治完全是以武力为后盾，而不晓利害，徒然以某种思想主张为念，岂不幼稚？可见就政治言，胡适之较之张君劢还是老辣些。

黄玉顺教授出版《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一书，嘱我作序。黄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期间，曾有交往，亦曾想招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门下，以便同堂论学，但黄君最后还是翩然去了蜀地。

以煌煌近三十万言来处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①还是破天荒的事。而实际上该书的论域决不限于论战本身，更多的是由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切入来清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书中纵论古今，比较中西，表现出作者的深厚学养和在驾驭重大理论问题方面非凡的能力。作者不赞同李泽厚关于论战的“思想史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的论断，认为“论战”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还远没有成为历史。该书的用意在于激活论战本

① 此处所称的本书的字数，乃指原本；今本已经删削。——黄玉顺注

身的“思想”意义，因而其所关注者也就不止于中国当时的学者文人们思考些什么，更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与我们当下思想学术的相关性。从内容来看，该书也确实把论战重新变成了一个“哲学的”、“思想的”话题，一个可以并且应当继续讨论的话题。

与李泽厚的处理方式相比较，作者表示赞同我在80年代末期有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一点谬见，其中特别关涉到凸显论战的哲学义涵，认定论战为“中国现代哲学真正的逻辑起点”。需要说明的是：我非常赞同和欣赏本书切入的理路及其由此所展开的庞大系统，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近年来思想史的兴趣似乎更浓厚一些，所以才引发了上面的议论。以这样一篇文字作序，多少有一点文不对题。这是应当向本书作者表示抱歉的。

2002年3月

一、几个前提问题

1. 科玄论战的“问题”所在

科玄论战的性质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近八十年了，然而在这几十年间，论战中所涉及的问题不断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乃至争论；其中的是非曲直，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这场论战的性质，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是：“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内容、材料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问题的核心却在于：现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这场看来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纯学术问题的论战，从根本上却是两种社会思想的对立。它具有着思想史的意义。”“科玄论战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的讲求探讨，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所以这次学术讨论，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它实质上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

之争。”^① 这个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思想史”的意义：玄学派的意志主义、人文主义，科学派的认知主义、科学主义，唯物史观派的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可说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科玄论战所牵扯的问题确实很多，仅就人们已经着墨甚多的重大问题来说，就有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于张君勱思想体系的评价问题，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个别即是大全。然而我们以为，这场论战的另外一种意义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更为不可忽视，那就是对于哲学史或人类思维史的意义。

本书没有包举“大全”的野心，我们只想就科玄论战中涉及的一些纯粹的哲学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它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② 不仅如此，科玄论战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确实是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人类思维史意义的、真正的当代哲学前沿问题。这些都是人们至今着墨不多、然而恰恰是具有根本性的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不敢苟同李泽厚先生所作出的下述判断：“不是宇宙论，不是认识论，不是科学的本质、内容、范围，也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是具体的人生观成了时代的焦虑、学术的主题，成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寻找追询以便确定或引导自己的生活道路的现实指针。”^③ 这显然是把哲学学术问题跟现实人生问题绝对对立起来了。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科玄论战实质上跟“科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7、58页。

②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第39页。

③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7页。

学”和“形而上学”即哲学问题毫无关系，何以那一大帮参战者却还在那里文不对题地大谈特谈哲学和科学呢？可见科玄论战确实是跟哲学问题大有关联的。事实上，科玄论战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恰恰在于力求从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高度上，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作出解答；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解决人生问题置于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基础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如果不能从哲学根本理论上解决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所谓“人生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看法与李泽厚先生的正好相反：这场科玄论战，其哲学史或者人类思维史的意义大于其思想史的意义。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果不从哲学高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科玄论战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假定科玄论战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意义，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也就是说，假定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已经使科玄论战的那种“思想史”意义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试问科玄论战提出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本身就得到解决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科玄论战提出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其实正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全球性的、人类共通性的一些问题。科玄论战不仅具有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尤其具有世界思想史的意义。所以，我们打算集中精力于探讨科玄论战所提出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当然，我们所说的从哲学上对科玄论战加以分析，决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化贴标签的做法。那种做法，举例来说，有学者称：“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无非是反动哲学内部一场分不清是非的争吵”；“什么玄学派，什么科学派，他们都是唯心主义派，在哲学的两军对战中，他们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① 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当年陈独秀已然如此：科学

① 吕希晨、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08页。

与玄学的对立，在陈氏那里被简化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而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存疑的唯心论”，在陈氏看来也与玄学家张君勱的“新宋学”相差无几。然而历史已经表明，这种“哲学的”处理方式是不解决问题的。玄学派、科学派，他们都是绝对“反动”的吗？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对立”的吗？只要指出他们是“唯心主义”，就万事大吉了吗？事情恐怕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远远不是一个“无非”就能说透的。

而且，这种简单化贴标签的处理方式，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当年的唯物史观派固然与科学派有对立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它们两者在针对玄学派时是结成了“联合战线”的，因为它们共同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更多地是接受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对现代新儒学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似乎重视不够。1923年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之间结成联盟就颇能说明这一点。”^①此乃是当年的铁的事实。

再者，这场论战诚然是由张君勱的“人生观”演讲引发的，论战中也频频出现“人生观”的字样，因而被称为“人生观论战”；但如果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关于人生观或者人生哲学问题的论争，那是非常狭隘的。实际上，它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进一步说，论战中所谓“玄学”指的就是经典意义的“哲学”或曰“形而上学”，所以，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哲学与科学的冲突；^②并且，根据论战的内容及其背景，我们还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83页。

② 当时王平陵有一篇文章，题为《“科哲之战”的尾声》，其中“科哲之战”的提法，就是相当准确的。此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哲学的冲突是由来已久的。两者的关系颇为复杂，但从近代以来，则主要是这样一种互动关系：由于科学要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两者发生冲突；但是由于两者毕竟是人类思维一以贯之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又互相渗透。